

真情拾贝

太爷与我

■王瑾

春日春分。我和妈从村里坐着大巴赶到城里,虽已清晨,天却阴沉得可怕,黄沙带着小雪,一点没有春的迹象。

奶奶取出一条白布让我戴在头上,我哭闹着不要。小院西北角那间小屋里,太爷直挺挺地躺在地上,双腿捆着麻绳,脸上盖着黄纸,周围草席上围着他的儿孙,恸哭声一阵接着一阵。

那时还没有人告诉6岁的我,何谓死亡,但我知道,太爷已不能活在我们中间了。

小院内,老师傅正在画棺材,他对我说这是喜丧,所以棺材要画红的。我挨个问他那些活灵活现的小人儿和动物是啥,他说那都是孝顺老人的故事,其中有一个叫“卧冰求鲤”。

起灵那天,我就站在窗口。四五点钟天还未亮,小院里灯火闪烁,人声熙攘。画好的棺材真漂亮啊,棺材前头有条龙,亮

着的两只小灯泡是它的眼睛,金粉涂抹的鳞片栩栩如生。不知谁一声惊天动地的吆喝,爷爷摔烂了烧纸钱的瓦盆,紧接着大人们的哭声响彻云霄。

太爷真的要走了。

我本想假装玩耍,可隔着玻璃无意间看到小叔痛哭的脸,便也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。

那天,太爷的灵柩放在斗篷卡车上,许多人冒着严寒一路送行,将太爷送到了一百多公里外的山沟沟里。

奶奶曾说,太奶奶去世前含糊着说她要去的方青山绿水,大家都敲锣打鼓地欢迎她。我想,这次她肯定在众人簇拥下,欢喜等着太爷爷的到来。

记忆里,太爷爷在我家果园的小屋里,茶炉旁,守着一小罐即将翻滚的茯茶水,刚一开就要下嘴。他喜浓茶,尤爱喝泾阳茯茶;他也爱抽烟,我常见他用报纸裁成的纸片卷烟。果园里,常是他弯腰锄草,我和众孩子在旁嬉耍的场景。

那时,“放养”在田间地头的我,常跟着太爷烧蓬草,烧成的蓬灰卖给牛肉面馆,太爷便拿钱买葡萄干给我吃。这辈子,葡萄干我总是吃不腻的。

再遥远的故事,全都是家人讲给我听的。我刚出生时,太爷欢喜之余还想要一个重孙,差点给我起名“招弟”。后来他一直任性地叫我“弟弟”,而不叫我的小名“静静”。幼儿时期,爸妈忙着苦钱,奶奶还未退休,照顾我的重任就落在太爷身上。他是个生活极其规律的人,每天定点为全家烧水,为我温奶,尿布一定要用开水烫好了挂在院里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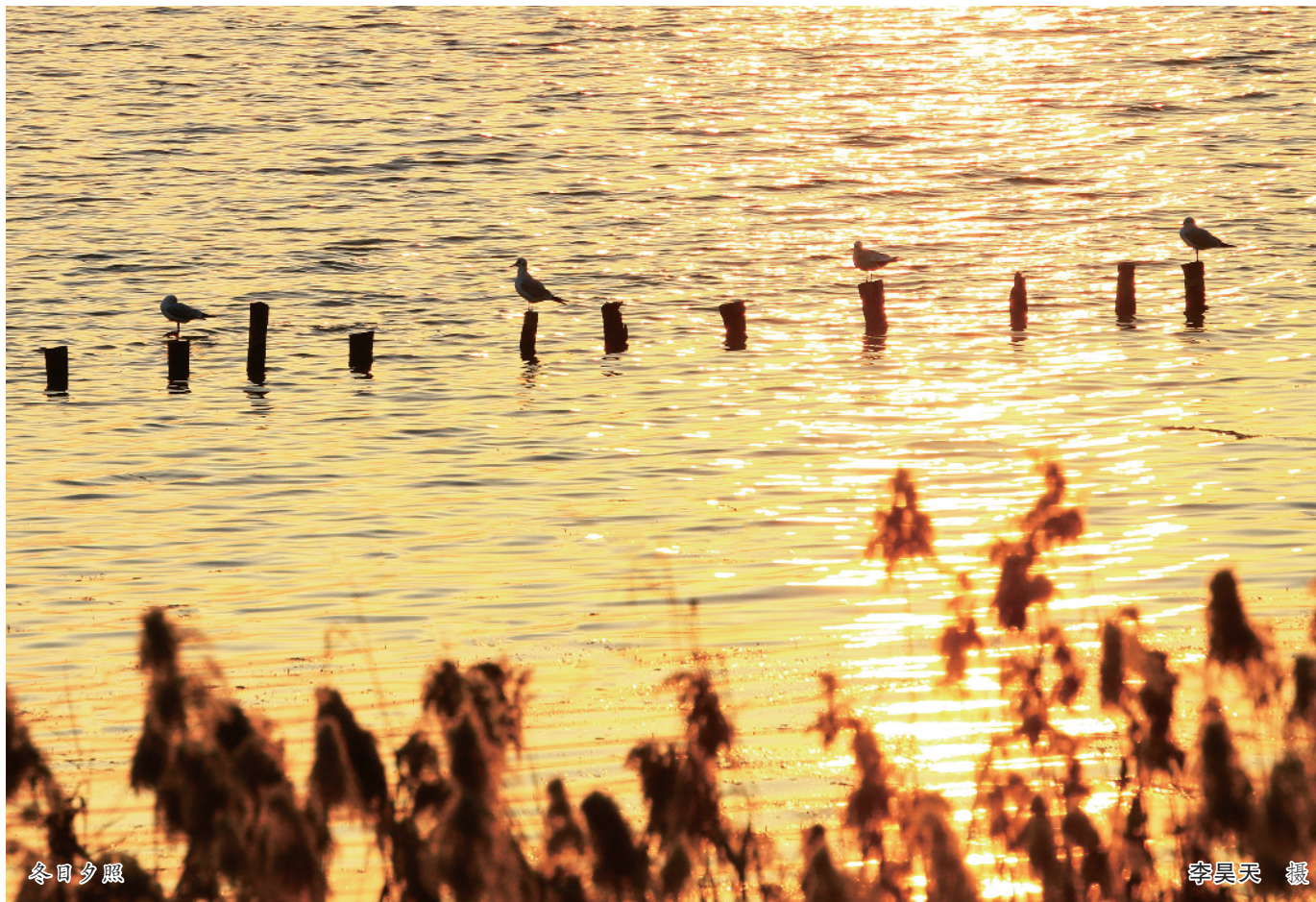
1987年至1990年,太爷推着我几乎走遍兰州城东的大街小巷。车上挂满了家当:一把小笤帚,一个棉花坐垫,一条绳子,一条小被子。推累了,太爷找个人多的地方和老哥们闲聊,绳子拴在小车上,一推一拉,我便乖乖睡去了。

小时候我喜吃桃和软儿梨。白粉桃一上市,太爷便迫不及待买来喂我。冬天冻黑

的软儿梨,放在炉边消软了,专给我喝果汁,说是润肺。“这孩子吃桃要‘浑圈’(囫囵)的。”至今我妈在回忆太爷与我的故事时,还常用蹩脚的天水口音说起这句话。

太爷生于1909年,一生躲过战乱,避过灾荒,在地主家种过田,赶过车,甚至还在兰大医学院的解剖室里看守过尸体。他的一辈子,尽是与贫穷的斗争。他爱搜罗废铜烂铁,一屋子都是舍不得扔的瓶瓶罐罐;窗角上总挂着别人不吃的发霉的馍馍干,他泡着牛奶能吃一大碗;他爱穿打了补丁的衣裳,常久久地坐着搓麻绳、缝布袋。儿孙平时给他的零花钱他都攒着,有一年他像得了宝贝似的告诉我爸,他用2000块买了100个“袁大头”,“穷了一辈子,终于有东西留给后人了。”他欣慰地说。虽然“袁大头”全是假的,但我们都没告诉他……

长大后的我,看过许多风景,做了许多梦,虽然不常梦见太爷,但每次看到那些上了年纪的矍铄老人,我都会想起他,想起有太爷呵护的我的童年。



冬日夕照

李昊天 摄

人生行板

幸运的人

■梁万年

有人说1962年到1972年出生的人是中国的幸运的一群人。我仔细一想,好像是。

生于1963年的我,虽说躲过了3年自然灾害,但那时绝大多数人一样,仍然处在吃不饱的状态。我们那里土地贫瘠,粮食产量低,加上我家人口多,要吃饱肚皮不太可能。现代人总说南瓜、山芋、胡萝卜的营养价值高,说实话那时我们非常讨厌吃这些。好在每次做午饭时,母亲总会抓两把米放在一个小布袋中和着菱蒿、胡萝卜之类一起煮,吃饭时,把布袋中的饭倒在碗里给我吃。我们姐弟5人,我最小,得到的关照也最多。

庄子上跟我同龄的有4人,我们几乎天天在一起。一起打猪草、滚铁环、爬树,一起玩弹弓,跟西边庄子上的伙伴打架。稍微大一点,放牛成为主业。牛背宽厚,我们或骑或躺,走到水草丰盛的地方,牛散放着,几个人堆锅垒灶,总能烧一点什么吃吃。最有趣的是带着几头牛和另一队的牛打架。一次双方的大牯牛斗红了眼,头顶着头,四个角相互交叉,不分胜负,也无法分开,我们不得不各自找家长来用棍棒把它们分开。下雨天,我们则头戴斗笠,身披蓑衣,侧坐牛身,颇有意境。

穷困好像更多体现在穿上。那时春节,我们不一定都有新衣服穿,但鞋肯定都是新的。那是母亲熬了无数个夜晚,用已经有了一道道血痕的手,一针一线纳鞋底,做出来的。上初中的时候,我不肯再穿哥哥们的旧衣服,而是特别羡慕别人的的确良衬衫。晚上我偷偷穿上哥哥们宽大、雪白的衬衫,在月光下游走一番,特别开心。

最幸运的事是恢复高考。那时我们农村的年轻人最好的去处是公社里的农具厂,如果有过硬的背景,还可以去县城里的机械一厂和化肥厂等。像我们这样的家庭,成分不是很好,进城根本不可能,想当兵也过不了政审关。二哥和大哥都因为家庭成分问题,没能继续升学。有天突然听说恢复高考了,不久后毕业的学生就有考上大学的,转户口、吃公粮,变成国家人。实实在在的事情在自己身边发生,一下子让我找到了奋斗的方向。

我所在的中学离家大约有8里路,上学放学全靠两条腿跑。路上要经过一片乱坟地,晚上如果一个人走,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。那时由于大地震的发生,我们都住在防震棚里。那防震棚是用几根芦苇裹着稻草做墙,然后用泥涂抹,里外透气,晚上冰冷刺骨。我裹着一床小被子,在昏黄的煤油灯下读书,早晨起来,鼻孔总是被油烟熏得黑黑的。

高中毕业我并没能考上大学,但一家人谁也没有怨言,都支持我到县中复读。其实那时的目标并不明确,没有所谓的理想中的大学,也不知道有哪些高校,更不懂专业是什么意思。那时我只有一个念头,那就是考出去,吃公家饭。至于上什么学校,读什么专业,做什么工作,则都随便。

功夫不负苦心人,我终于考上了一所专科学校,跳出了农门,改变了命运。我赶上了一个好时代,真正成为幸运的人。

故土情怀

乡关难忘

■鞠恒君

从外求学到异地工作,弹指一挥间,离开老家已经20余载。岁月留痕,皱纹爬上眼角,白发陡增几根,家乡的印记却愈发明晰起来。

我家在平原地区,父辈们在这里出生、成长,辛苦劳作,秋收冬藏。这里一年主要种两季庄稼——夏水稻,秋天小麦。农忙时节,老人孩子也一齐上阵,到处弥漫着麦子和稻穗的味道。我印象中,我家有两块比较“著名的”大田,一块是“印字田”,一块叫“年跟前坟跟前”。前者兴许成方形,似印泥;后者也许真的挨着一个叫年跟前人的坟墓。那时放学回家,找不到家人,就问左邻右舍,他们就说:“在印字田呢。”除了两块大田,那些小田的命名

心灵火花

孝子与孝道

■周大桥

老孙,全名孙世林,50后,乡村教师。年近退休了,他却忙个不停。家有九旬老母,他每天帮她穿衣服、脱衣服,洗脸、洗脚,隔三差五还要洗头,剪指甲……像服侍一个9岁孩子那样。

老孙从教40多年,远近闻名的却是他的家庭角色:孝子。一边身教,一边言传,老孙现在给孩子们上的就是思想品德课。

老孙的妈妈年轻时,忙农活,织渔网,样样在行。10多年前,老伴去世,她和儿子媳妇住到一起。后来,儿媳到城

就更奇特了,在沟沟渠渠,在河河道上,在与邻村的交界处……我很好奇为什么爸妈总能如数家珍地把分散在村庄四周、边边角角的地都记得那么清楚。

在老家,父辈们说去买点菜,一定是买荤菜,很少有买蔬菜的,因为一年四季的蔬菜家里都有。小葱大蒜之类就更不用提了,即使自家正巧没了,到左邻右舍找点,也绝对没问题。这么多年来,每次我离家,东家的大妈会送点青菜,西边的奶奶会送点大蒜,乡里乡亲,必须收下,不然就显得生分了。

夏天是乡间最富庶的时节,黄瓜、西红柿、茄子……一应俱全。到了做饭的光景,妈妈门前屋后走一趟,菜篮子就满满当当的了。丝瓜是农村最常见的蔬菜,爬满屋顶、树梢。到了秋天,总有

些丝瓜因为爬得太高够不着,成为漏网之鱼。自然风干后,种子掉下来,来年又会长出瓜蔓。还有豇豆、扁豆,总是吃不完。但农家人自有办法。待到扯藤清理之前,全部摘下来,用水一焯,晾干。过年时,一道干扁豆烧肉,香飘满屋。

近几年回老家,发现乡村的土路已经变成了水泥路,老家门前的小河被整饬一新,河两岸垒起石块,绿化也跟城里差不多了。然而,却很少能看到一大群一大群的孩童们嬉戏打闹了。我们儿时,在田间地头、沟渠河岸撒欢乱跑乱追,响铃般的嬉笑声在田野上肆意蔓延,和着母亲悠长的呼唤声,度过了愉快的童年。而现在,这画面也荡然无存了。

老家不老,乡关难忘,总有那么一缕衷肠,两三言语,是专门留给家乡,说给家乡听的。

上还会赖床,动得少,消耗小,吃得就少。老孙觉得不能这么恶性循环,他开始劝说母亲多到外面走走。一天,老孙拿着体检报告回家,故作垂头丧气状。孙奶奶发现有些不对劲,老孙就顺势推舟,忽悠老母亲说,刚刚查出重度脂肪肝,医生建议每天饭后必须散步半小时。其实只是轻度,而且他是加重语气说的。孙奶奶当然希望儿子听医生的,立马自告奋勇:“我陪你。”老孙的“骗术”又一次得逞。

老孙就要离开他心爱的讲台了,接下来,他还有“乡村一课”:陪母亲。老孙奶奶耳聪目明,他已经做好了斗智斗勇的心理准备。

风物杂谈

电视情缘

初次听说“电视”一词,还是我上初中的1973年。一天下课后,要好的同学丁正偷偷对我说,区委大院有一台“电视”,像大收音机似的,能放“小电影”,银幕只有手帕大小。耐不住好奇,放学后,我跟着丁正来到区委大院礼堂外,透过窗户向里望去。只见屋中空荡荡的,只有主席台右侧有一木棚,长长的脚,像百叶箱似的。门敞开着,里面也是空荡荡的,一根线连着外面高耸入云的天线。至于“电视”,没见着。

我不甘心,以后的几天,我每天都要去一趟区委大院,可还是什么也没看到,最后连木棚和天线也不见了。我失落、无奈,想见识一下电视机的愿望只有深深埋入心底。

1979年2月,我考取了师范学校,并第一次看到电视:当时学校刚买回一台进口的20英寸黑白电视,每周未对学生开放一次。因信号较差,图像不但有雪花点,还隐隐的有好几道水平干扰条纹上下滚动。尽管如此,周末的小礼堂还是人山人海,连走廊的窗口处也挤满了人。同学们看得津津有味,散场时都是恋恋不舍,期盼下周末早点到来。

毕业后,我回到家乡如皋工作,每月34.5元的工资,不吃不喝不用,一年下来还不够买一台12英寸的黑白电视。但每次到百货商场,看着陈列的电视,我的心里总是痒痒的,可囊中羞涩,只好“望机兴叹”。我在心中暗暗发誓:一定要买一台电视机!

1985年5月,县教师进修学校贴出海报:暑期将举办首届电视装修培训班,一套散件连同培训费,只要320元。这比起商场近600元的成品机便宜多了,我怦然心动:机会来了!

一放暑假,我就怀揣一家人凑足的300多元钱,来到县教师进修学校。三四天的理论学习后,我对黑白电视机的各部分原理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。接下来开始装配,几百个元器件,小到圆珠笔头似的电阻器,大到拳头般的变压器,几十根导线,上千个焊点……不到两天的时间,居然无一差错,全部被我焊接成功。指导老师一调试,图声俱佳。就这样,我了却了自己多年的夙愿:我终于也有自己的电视啦!

这次的装配成功,让我逐渐对无线电产生了兴趣,常有“豆腐块”的文章发表于各类报纸杂志,学校也让我担起电子技术课的教学任务并负责电教工作。

1998年底,学校安装了校园闭路电视系统,每班一台29英寸的大彩电,每天由我收录半小时的《今日说法》《焦点访谈》等节目,傍晚放给学生看。这十分受学习高度紧张的中学生的欢迎。虽然是8小时之外的工作,中饭也常常是两块面包、几片榨菜加一杯白开水,但我乐此不疲。

有时因公外出几天,学生要几天看不到电视。我想起自己学生时代看不到电视的苦恼,内心感到愧疚。于是我花费两年多的业余时间,先后设计制作了自动放像定时器和全自动录放像定时器,并最终实现了录放像机录像、倒带、放像、关机等功能的全自动转换,即使工作人员几天不到场,工作也能自动进行。

付出总有回报。学生看《今日说法》写了许多观后感,雪片似的汇集到校报编辑部,并以整版的篇幅刊登出来。以此为基础,我写了一篇我校师生收看《今日说法》情况和效果的报道,寄往中央电视台。2000年4月,《今日说法》首期改版录用了我的报道。此后,我和我的家人以及学生又多次亮相于各级电视台。

时过境迁,当年自己组装的黑白电视早已退出“历史舞台”,但因难以割舍的情结,我一直没有把它扔掉。每年的大年三十,当人们欢天喜地迎接新年的时候,我都会从车棚的角落把它搬出来,仔细地抹去上面的灰尘,静静地注视许久……

(陈金华口述,陈晓整理)